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

章开沅 朱 英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

章开沅 朱 英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

章开沅 朱英 主编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625 字数503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22—0624—4/F·39 (精)

印数: 1—200 定价: 11.90元

ISBN 7—5622—0584—1/F·37 (平)

印数: 1—1000 定价: 7.90元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 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章 开 沅

各位来宾，各位学者：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幕了。我代表会议主办单位，也代表学校一万多名师生，热烈欢迎各位先生的光临。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着重探讨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时间的断限则是1840至1949年。这是一个旧社会逐渐走向衰亡，而新社会却迟迟难产的时代。用今天人们习惯的语言来说，就是中国从封建社会一步一步沦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时代。欧风美雨，西潮东渐。中外文化的冲撞交流，对外经济关系的畸形发展与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主要是通过西方殖民主义用血与火暴力促成的。整个社会结构所承受的巨大震撼是史无前例的，用当初人们习惯的语言来说，则是“开天辟地未有之奇变”。

这一百多年的中外关系史，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充满着欺凌、压榨与剥削。因此，在既往一些有关上述议题的论著中，往往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研究方法却并非总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义愤可以产生诗人，却不能代替科学。科学需要理智，需要周密的剖析与深沉的思考。东坡《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作者并非不可知论者，他不仅承认庐山真面目的客观存在，而且还找出了“不识”的原因，

无非是由于人们主观认识的局限。识山固然不易，治史恐怕更难。远近高低和前后左右，指的是观察的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角度和侧面有别，则其印象必然有异，即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然而史学决不能仅限于形貌的观察，即令是将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所获取的印象统统综合起来，也无非是或多或少接近于历史本来面目的比较完整的形体。如果要透过现象达到本质的认识，把握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则又必须借助于理论思维，要求史学家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当然还需要各种认识手段及工具的不断改善。

不同学术见解之间的争论是正常的，而且是各种学科发展之所必需。我们历来欢迎提倡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交流、辩论、校正、补益。只要是真正的学者，只要是严肃的学术成果，我们就应该给以足够的尊重。只有如此，才能不断扩大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路，发扬我们的长处，克服我们的短处。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富有吸引力的，提交会议的论文大多也是具有真知灼见的；我相信，会上会下的讨论也一定是非常热烈和饶有兴味的。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对于有关学科的发展有所促进，对于我国当前的开放、改革与“四化”建设能够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那么，我们大家都将为此感到欣慰。

现在是武汉，也是我们校园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风和日丽，景色如画。年轻的大学生们正在举办第一届“桂子山之春”艺术节，他们以各种艺术语言从事美的创作，并且把热情与友谊奉献给来自各地的尊贵客人。所有这一切，或许可以为会议提供一个比较优美的环境，并且多少弥补我们准备工作的缺点与物质条件的不足。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主办单位与华中师大全体师生，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大家健康愉快。

谢谢。

目 录

开幕词·····	章开沅 (1)
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吴承明 (1)
立德和川江的开放·····	汪敬虞 (12)
轮船的引进与中国的近代化·····	聂宝璋 (28)
中国海关的近代化设施及其对清政府的改造 ·····	陈诗启 (35)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胡 滨 (38)
上海初期租界和城市经济近代化·····	黄逸平 (40)
招商局与日本邮船会社比较研究·····	张伯昭 (42)
中外产品竞争与企业的近代化	
——以上海若干民族资本企业为例·····	潘君祥 陈立仪 (56)
世界经济大危机与1929—1936年武汉的工业 ·····	孙景汉 (72)
中外经济关系演变与近代化的定位融和·····	桑 兵 (88)
论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与合作·····	虞和平 (102)
通商·文化移动·心态变异	
——论通商对清末上海城市发展及其社会心态的影响 ·····	乐 正 (104)
中国的企业精神与西方的影响·····	〔美〕陈锦江 (121)
晚清中美商业资本主义与中国近代化 ·····	〔美〕郝延平 (131)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萧条对中国通商口岸经济的

影响(1921—1923年)……………〔法〕白吉尔(155)

清朝末期南洋华侨在祖国的企业经营

——以爪哇巴城侨商梁炳农为中心

……………〔日〕小島淑男(181)

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日中通货战与沦陷区

……………〔日〕古厩忠夫(189)

论清末自开商埠的积极意义……………彭雨新(194)

长江开放与流域经济近代化轨迹……………皮明庥(207)

晚清重商主义与近代化……………王 笛(224)

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

——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马 敏(241)

清末直隶官商联盟及其影响……………韩 明(243)

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清政权的历史地位

及其作用初探……………朱 英(258)

论晚清通讯业的近代化……………徐元基(281)

简论中国近代商业资产阶级……………杜恂诚(283)

唐廷枢与近代民族工业……………张富强(285)

“五四”运动后上海商界之革新潮流(1919—1923)

……………〔日〕陈来幸(286)

清末无锡地区蚕丝业的发展……………〔日〕铃木智夫(304)

清季民初中国城市群众动员之型态

……………〔香港〕陈明铨(326)

从机器缫丝业看在华外国资本……………〔日〕奥村哲(343)

中美贸易与旧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张仲礼 李荣昌(356)

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近代化(1843—1936年)

……………丁日初 沈祖棻(374)

对外贸易与上海经济的近代化……………徐雪筠(392)

同光之际中外经济联系的加强与苏城社会

经济生活的变动……………唐文权 (394)

近代台湾对外贸易对地方社会经济之影响……………李祖基 (408)

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演变……………王永年 (421)

世界经济大危机与湖北农产品商品化的变化

……………班耀波 (437)

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品的竞争

……………〔美〕赵 冈 (454)

近现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工业发展

……………〔日〕久保亨 (463)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贸易的变化

……………〔日〕高纲博文 (476)

对外经济关系与大生资本集团的兴衰……………章开沅 (482)

19世纪中叶中国通商口岸的钱庄……………张国辉 (499)

清季西方资本与长江航运的近代化……………陈 绛 (510)

“满铁”与中国近代化……………解学诗 (512)

从汉冶萍公司与日本的经济交往看国家近代化

的政治前提……………戴 鲁 (527)

四国新银行团和湖广铁路续借款案……………夏良才 (529)

华侨投资对沿海城市的兴起和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林金枝 (531)

清末民初的日本借款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1901—1919)

……………赵 军 (550)

钱流海外——瑞典火柴公司在中国：1930年代

……………〔美〕高家龙 (566)

20世纪20年代的东北经济特征及问题点

——以考察对外经济关系为中心……………〔日〕松野周治 (574)

条约口岸的政治、投资与经济发展

——荣家棉纺织业投资初探……………〔美〕李达文（ 590 ）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韩明 朱英 王永年（ 601 ）

后记……………（ 616 ）

早期中国近代化 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吴 承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包括经济上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新的国家家庭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建立等诸方面。一篇短文不能不限定自己的范围，本文限于讨论经济方面。

近年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至少有一个重要贡献，即突破了“冲击——反应”模式。这种模式把近代中国的一切变化都归之于19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条约口岸等都是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以至是打破中国“传统平衡”或“贫困循环”的唯一动力。在中国，则常是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切演变都归之于帝国主义入侵的结果，或是半殖民地的产物，以至有些好事也变成坏事。但是，西方的冲击是世界性的，而受冲击各民族的结局迥异。中日对比和中国与印度等国对比的研究尤启人深思。于是人们开始寻求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以至有人提出要找到一个历史线索，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来解释中国近代发生的事情。

寻找中国内部能动因素，也就突破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理论。这种理论可追溯到黑格尔，以至马克思也受其影响，把封建的中国看成木乃伊式的社会。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于宋代以来商品、货币的发展和人口、价格等变动的研究颇有贡献。中国学者对明清农业、土地制度、租佃和雇工关系的演进有不少精湛的探

讨，1955年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尤有成绩。

19世纪后半期中国新式工业的创建，可说是中国工业化的萌动时期。正是这种萌动，导致史无前例的辛亥革命，迈入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这种萌动以及当时的所谓西学，无疑是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结果。但不完全是这样。它的出现和发展，同样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而辛亥革命以后的道路，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一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西欧中心主义），而要走它时代的道路；这是晚近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项成果。熊彼特把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英国产业革命结束在1842年，而把自此至1897年作为“蒸汽和钢铁时代”。这两个年份恰巧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左右；利用这种巧合，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产业萌发时期的特征：这时期，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然而，纺织工业后来却成为中国唯一略有发展的工业。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机船矿路”路线失败的结果，也是中国近代化步履蹒跚的原因。

当时“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两者都是追赶时代的工业。以造枪而论，1830年以后，西方就通用前膛来复线枪了，上海江南制造局于1867年才仿制这种枪，晚于西方37年。1865年以后，西方已用后膛枪，江南局于1884年仿造林明敦式后膛枪，晚于西方20年。1880年以后，西方已用连发式毛瑟枪，江南局于1893年试制成每分钟22—25发的快利枪，晚13年。1890年以后，西方已用小口径步枪，湖北枪炮厂于1896年造成10响小口径毛瑟枪，晚6年。亦步亦趋，差强人意。同时，江南制造局还

生产了大量各式机床和各种作业机，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机械师和技术工人，翻译出版了不少科学技术书籍，为以后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外国资本在中国建厂比中国人自建近代化工厂早15年，但外国资本不开设专业机器厂，因为向中国输进兵器和机器是洋行的一大业务，他们不必自我“替代”。他们自然也无需培养技术人材，而是培养买办。在这里，资本输出没有给中国带来“模仿效应”，更谈不上“技术转移”。

再看船。福州造船厂自1869年起在法国人主持下造了15艘轮船，都是木壳船。1874年外国技师撤退，全由中国人主持，才开始追赶。1877年首次造成威远号铁胁船，比英国首造瓦立耳号铁胁船晚16年。1883年首造开济号铁胁巡洋舰，比英国首造罽拍尔号铁胁巡洋舰晚8年。1888年首造龙威号钢甲船，比所仿制的法国柯襄德号晚3年。福州船政学堂和选派出洋留学生培养的造船、驾驶人才比江南制造局尤有成绩。

和机器不同，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有耶松、祥生大船厂，与中国的福州、江南船厂竞争。80年代，这些中外船厂都有造2000吨级轮船的能力，20世纪初升到万吨级。但是，它们造船的路线不同。外国厂造船，照例是从国外进口轮机、锅炉等，在上海配造船体。这是因为，在中国制造轮机成本要加倍，并且，进口机件原是外商企业的本业。中国人的打算完全不同。从40年代丁拱臣造轮船模型起，1862年华衡芳等为曾国藩造黄鹄号，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造小火轮，就都是自造轮机，以使“洋人之智巧中国人亦能为之”。左宗棠在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就说：“轮船一局，实为习造轮机而设”。福州局于1870年开始造单膨胀蒸汽轮机，1876年开始造复式轮机（康邦机），在当时已是新式的了。

中国的机器厂和船厂虽做出努力，但是，由于缺乏基础工

业，所需钢材、钢配件、铜料以至船用木料都需依赖进口，制造成本要比购买外国成品高得多。造机不如买机，造船不如买船。加以在官僚体制下，管理腐败，不能正常生产，甲午战争后即陷于停滞。追赶路线终于败于进口路线。

当时所谓“矿”，主要是煤矿；“路”指铁路。第一个用新法开采的矿是1878年投产的台湾基隆煤矿，而最成功的是1881年投产的开平煤矿，它生产日盛，已在北方市场上排除了进口洋煤，盈利甚丰。到1900年中国已有约30个机械开采的煤矿，都是中国人自办，大部分是民营。铁路是外国人首办的，即1876年的吴淞铁路。但那是一条长仅18公里的、2.5英尺轨距的轻磅轨小铁路，不供货运，一年后拆除。第一条实用铁路是1880年李鸿章修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同时由胥各庄车厂造出第一台0—3—0型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截至1900年，中国人已修建了1066公里的铁路，都是用4英尺8英寸半标准轨距和85磅标准钢轨，具有近代化功能。

在中国机械采矿和修建铁路22—25年之后，出现了外国资本的煤矿和铁路，并立即打败了中国资本。这是因为，西方（这时包括日本）是通过一场西方称为“让与权之战”（Battle for concession）取得采矿权和铁路权的，以武力为后盾。从经济上说，外国投资的矿，大都是中国资本已经开采略有成效的矿，外人加入资本，并取得管理权。采矿是风险事业，这种办法最为得计。最早是1900年的开平煤矿和1902年的抚顺烟台煤矿，前者是由英军占领矿区，然后强迫中国人将开平“卖”给英国公司；后者则俄国只派出40名俄国兵，就完成了与中国矿主的“合作”。到1911年，中国机械采煤已有500万吨，其中440万吨是开平、抚顺等外国资本控制的七大矿生产的。同年，中国已有9292公里铁路，其中3718公里是外国资本修建的，3300公里是外国贷款修建的。

外国人修建铁路理所当然用进口的钢轨和机件，而在1900年以前中国自建铁路时，就在“机”“船”之外更突出了缺乏钢铁问题。西方资本不在中国设钢铁厂，道理很简单，他们是钢铁输出国，1881—1891年输华的钢铁增长了10倍。直到1919年，钢铁资源的日本才在鞍山制铁，那已是中国自办近代钢铁事业30年以后的事了。

1889年，在山峦起伏的贵州省首先出现了高炉和贝色麻炉，即青谿铁厂。该厂不用洋技师，日出生铁20吨；创办人潘露竟因此积劳致死，该厂也夭折。首先出钢的是1891年江南制造局的马丁炉，继之有1893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局钢厂和汉阳铁厂。天津厂毁于八国联军炮火，汉阳厂则发展成为当时东亚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历时9载，耗资500万，誉少毁多。但他是一心一意要在中国创办钢铁事业，走先炼钢、后修路的路线。1889年他给李鸿章的电报说：“晋铁如万不能用即用粤铁，粤铁如亦不精不旺，用闽铁、黔铁、楚铁、陕铁”，“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这使我们想起前述熊彼特的“钢铁时代”，张之洞可谓不自觉地捉捕到时代脉搏。李鸿章却无此感，他复电说：炼钢“岂能各省同开”，又说：日本铁路日增，“唯钢轨等项仍购西洋”。的确，日本的八幡制铁所1901年才出铁，比汉阳晚7年。1910年（1911年因武昌起义停产）汉阳厂产生铁11.9万吨，钢5万吨，钢轨等2.8万吨；这点产量在世界上无足挂齿，但已相当于当年进口钢铁的五分之四，以后一个时期并超过进口量。但是，汉阳厂并未能成为进口替代工业，由于逐步被日本贷款控制，它的产品须低价供给八幡制铁所，为日本的工业化服务。最后，汉阳厂亏累不堪，全面停顿。

上述这些新工业的出现当然是西方冲击的反应。但就每项工业的产生说，都不是来自西方的意愿，而是中国人努力的结果，

尽管是失败的结果。就当时“求强”“求富”的思想和“机船矿路”路线来说，也不完全是“冲击——反应”模式，它们的形成，还有自龚自珍以来的“思想之解放”（梁启超语），以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明夷”思潮。不过我不拟在这方面多作探讨，而转到另一个具体内部因素，即传统经济中手工业的发展。

二

西欧的工业化，有个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代（1500—1750年）。实际上，那时的工场手工业并非十分普遍，但马克思称之为“时代”并非夸大其词，而是指出其重要意义。在这种经济中，尽管生产力还是手工的，生产关系则已是资本主义的了。那时的西欧，和19世纪的中国一样，所谓近代化，就是破除封建障碍，实现资本主义化。西欧经济力量的膨胀，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资本价值观念的确立，都出现在这个时代。非洲、印度的征服，澳洲、美洲殖民地的开拓，都是靠工场手工业的威力。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手工工厂和农场发展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的近代理论就是这时出现的：托马斯·曼、威廉·配弟的全部学说，魁奈的《经济表》，都是手工工厂和农场的产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时，蒸汽机尚未在实用上推广。

中国没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这是中国工业化迟缓的一个原因。但中国也自16世纪就有手工工厂出现，只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在鸦片战争后才有了较大发展，这一点，迄今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鸦片战争后，洋货入侵，中国传统手工业受到摧残，但不象通常想象那样都成了机器大工业的牺牲品。我们考察了40个传统

手工行业（不包括艺术品行业），发现受摧残的主要是手纺纱、土钢、土针、踹布、土烛、制靛、刨烟丝、木版印刷八个行业，其余都能维持，多数并有发展，尤其是向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发展。到20世纪初期，这些传统行业中都有工场手工业形式了，并且，机器大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手工工厂发展最快的时期，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有这种情况。

鸦片战争后，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新工业，如火柴、制洋皂、制西药、铅石印刷、搪瓷、织袜、毛巾、油漆、化装品等。它们都是原来中国没有的，堪称近代工业；但引进后，却是改用手工生产，大部分是手工工厂。又因外贸出口，出现了一批新的加工工业，如肠衣、猪鬃、地毯、花边、草帽、发网等；它们或是手工工厂，或是散工制。

这样，我估算在1920年左右，资本主义手工业的产值，比之官办的、民办的和外国资本经营的机器大工业的产值加起来，还可能稍大一些。因而，它们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办工业，都是从国外引进整套设备。但是，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仍是先用中国式的泥坞手工操作，然后机械化；上海第一家外商船厂伯维公司也是这样。第一家官办工厂即1861年的安庆内军械所，初建也是手工工厂，以后添置机器；其后上海的洋炮局也是这样。早期的民营机器厂，大半是从打铁作坊发展而来，一些有名的大厂如周恒顺等，也是这样。它们先添置一两台手摇或足踏机床，经营有利，再添设蒸汽动力。

在其他行业中，如由手摇丝车到足踏丝车、汽喉足踏丝车再到蒸汽动力丝车；由手摇轧花车到足踏车、足踏皮辊车再到蒸汽动力齿轮轧花车；由木槽楔入油榨到人力螺丝油榨、再到蒸汽动力压力油榨；由畜力石磨到火轮石磨、再到电力钢磨；由投梭织

机到手拉织机、足踏铁轮织机再到电力织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1886年设立的宁波通久轧花厂，有40台足踏轧花机，1888年添装了蒸汽动力，积累资本，购进纺纱机，1896年成为有17000锭的通久源纱厂。不过，在纺纱业中，这只是特例。而在矿业中，就变成通例了。绝大部分机械化的煤矿都是由手工煤窑转化而来，它们先是添置蒸汽动力吸水机，积累资本，再添置上井口卷扬机，采掘仍用手工。金属矿也是这样，先添置几架蒸汽动力的铁杵捣石机，积累资金，再添置新式冶炉，采掘仍用手工。

中国没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这是中国的不幸。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这条近代化的道路，即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理论，仍是存在的。乃至在引进某些新工业时，还得回到手工工厂，作为补课。到30年代，由于电力稍见普及，过渡加速，工场手工业的比重降低了。同时我们看到，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之间，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工业之间，不仅有互相排斥的作用，还有互补作用。手工业中看来是传统的东西，同时也是进步的力量，因为它包含有能动因素，能够推动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成为工业近代化的积极因素。研究中国工业的近代化，显然不能只着眼于那些大烟囱工厂。同时，那种二元经济论，即把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理论，缺乏辩证思考，也是非历史的。

三

这样看来，19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化，本来应当走自己的道路，正如今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样。就是说，它应当不是西方生产方式的原样移植，而是新生产方式和中国内部能动因素的结合。历史是无情地失败了，以致我们还无法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但在失败史中，还是可以隐约地看见一些中